



新中国首面国旗诞生记

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一面鲜艳亮丽的五星红旗如一轮朝阳冉冉升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宣告成立。新中国首面国旗牵动着万众惊喜的目光。那么，将国旗设计图纸变成飘扬在广场上空的旗帜，这个任务是由谁来完成的呢？

很少有人知道，这面见证共和国诞生、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旗是由百年老字号“瑞蚨祥”绸布店提供的面料精心制作的。

踏上铁鞋有觅处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27日，政协通过国旗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为保证10月1日升旗仪式的顺利举行，周恩来总理要求国旗的缝制必须加紧。根据天安门广场上国旗旗杆22.5米的高度，国旗的尺寸定为长4.6米、宽3.38米。

9月29日上午，位于东单煤渣胡同的国营永茂实业公

司接到中共北京市委指示，要求赶制一面五星红旗，10月1日前必须送到开国典礼筹备处，这将是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亲手升起的国旗！时年29岁的业务科干部、党员宋树信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刻着手落实。这时，离开国大典只剩3天时间。

宋树信先找到了做旗杆套用的白布，但跑了北京很多家布店，却没找到颜色和尺寸都适合做旗面的红布料及做五星的黄缎子。

绸缎，现在看来或许是平

重庆这个村包产到户比小岗村还早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农业“大包干”，从此拉开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18位带头人的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状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小岗村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就在安徽小岗村进行农村改革的同年春天，我随江津县（现重庆江津区）委工作队进驻江津县石门区滩盘公社，任队部文书。一天，接到群众匿名举报，称旺龙大队第六生产队私分土地，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工作队研究后，安排我和另外两个工作队员立即前往旺龙六队实地调查。

出发前，工作队队长杨辉宗特别嘱咐我十二个字：“不要随意表态，务必实事求是”。在当时，私分土地涉及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斗争的大问题，杨队长这十二字诀，实际上是明确了我们此行的职权范围和指导思想。

走到旺龙六队，我们先转了一圈，明显的感觉是其他生产队集体的大块田地小麦长得好，小块自留地的小麦长得

常之物，但在1949年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国，可是稀罕物。宋树信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找了整整一天，没有收获。在朋友的介绍下，30日上午，宋树信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赶到前门外的“瑞蚨祥”绸布店。

一进“瑞蚨祥”，宋树信就向几位老职工说明来意。“瑞蚨祥”的职工一听事关重大，便一起动手去仓库翻找库存。经过一番翻箱倒柜，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货底发现了几块红绸和一卷3米多长的黄缎子。宋树信一见，喜出望外。但经过精确丈量，却发现几块红绸都不够长。认真负责的店员们赶忙找来一位手艺精湛的女工，抓紧时间把红绸布料连缀起来。

随后，宋树信抱上红绸布和黄缎子直奔位于西单的职工技术较好、政治上也可靠的新华缝纫社。当把布交给缝纫社时，他才发现黄缎子只有一尺多宽，做最大的五角星也不够。后来，经上级领导同意，在大五角星的一个角接一

在会场上，旗面展开后，主席台瞬间被映照得红光熠熠。毛泽东观看后，庄重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采，微笑地点头说：“好啊，很好嘛！”

（摘自《文史博览》余玮/文）

1944年5月20日，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刘少奇指出，“要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我们将来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工业化实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当时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

农业大国，应该怎样进行经济建设？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呢？刘少奇强调，世界历史上只有两条国家工业化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工业化过程中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避免失业、饥饿和破产的痛苦，并且不需要去侵略其他的民族和国家，更不需要进行战争”，因此，“这是我们应当采取并且必须采取也能够采取的道路”“除此以外，是没有第三条路的”。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1956年9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摘自《学习时报》杨志强/文）

刘少奇曾数次强调建设先进工业国

（摘自《重庆晨报》王逸虹/文）

个尖。

重任落在女工赵文瑞身上

缝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重任，落到了缝纫社女工赵文瑞身上。赵文瑞过去靠给人缝补浆洗度日，后来学习缝纫，对中国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技术也是最好的。赵文瑞双手接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泪珠夺眶而出。她态度严谨，先是反复阅读了政协会议公布的国旗说明，然后严格按照尺寸小心翼翼地用黄缎剪裁出两颗大五角星和八颗小五角星。接着，她分毫不差地将五角星粘贴于红色绸料的正反两面，烫干熨平后又飞针走线，用细密匀称的针脚缝牢缀实。长长的彩线，精细的针脚，缝进了赵文瑞对新生的向往、对新中国的热爱。

9月30日下午，宋树信将“瑞蚨祥”绸布店提供布料、赵文瑞缝制的五星红旗包裹好，骑自行车赶到位于天安门广场北面西侧的开国典礼筹备处。筹备处的同志当场验收，表示十分满意，随即送到怀仁堂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

在会场上，旗面展开后，主席台瞬间被映照得红光熠熠。毛泽东观看后，庄重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采，微笑地点头说：“好啊，很好嘛！”

（摘自《文史博览》余玮/文）

秦朝的货币危机

很多社会现象背后，其实都有货币的影子。秦朝的灭亡就和始皇帝的货币统一举措有着微妙而密切的联系。

在讲秦朝的货币危机之前，我们先要知道一个关于货币和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货币的数量决定社会分工的水平。

乍一听，这句话的逻辑很跳跃。经济增长可以等同为社会分工的进步，分工水平越高，越专业化，意味着经济越发达，它和货币数量之间并无关联。但仔细想想，你就会发现，社会分工通过市场交换实现，而市场交换必须依靠货币实现。货币之于市场，就像农田需要的水。鱼米之乡肯定雨水充足，缺水的大都是贫瘠之地。同样的道理，货币匮乏，就是市场的旱灾，很多商品生产无法进入交换体系，社会分工就会倒退，经济发展水平也会下降，甚至引发萧条。

秦朝灭亡之前，整个社会就处于货币极度匮乏的状态。

统一六国后，始皇帝面对着辽阔的疆域，信心满满。为了实现帝国的千秋伟业，他很快开始了对货币的强力统一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耕军

以衣着取人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说：“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粗略地猜测一个人的才能高低。”

一位名叫弗雷德·考布里克的共同基金经理曾参加过一次推介会。主办方是一家正处于快速增长期的公司，而陈述人则是这家公司的CEO。推介会的场面非常火爆，CEO的演讲也极富感染力和说服力。

会后，考布里克走到这位CEO面前，告诉他对自己这家公司的印象非常不错，而且很有可能买进他们的股票。就在

CEO欣然与考布里克握手时，考布里克突然注意到一个细节：对方衬衫的袖口上印着非常显眼的公司标记的花押字，而且考布里克发现该公司的另外几位管理人员的衬衫袖口上印有同样的花押字。

“就在这一瞬间，我不想再买他们的股票了，”他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说，“仅仅是买一件衬衫，他们都不考虑是否适合自己，而只是一味地迎

其是衬衫的袖口歪扭。

要这两位中的一位在你的肚子上动刀子，你怎么敢直言不讳呢？”

考布里克的评判标准看起来有点苛刻，但这也有一定的道理：穿着统一标记花押字衬衫的公司，会有着更严谨的上下级关系，同时员工的创造力会更弱，这样的穿着在硅谷不可想象。

《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曾提出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假设你需要选一位外科医生给你做手术，两位候选人在同一家医院的同一个科室，而且旗鼓相当。

不过这两位医生的外表和穿着看上去似乎有很大的区别。一位外表干练，衣着得体，戴着一副银丝边框眼镜，身材保持得很好，双手十分精致，谈吐不俗且举止优雅，一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

真正有能力的人不靠衣着发出自己有能力的信号（想想永远穿着随便的乔布斯，衣着像个老人的袁隆平院士），这也被称为“反信号传递”。

所以，如果你遇到那些其貌不扬穿着随便的专家，他们大多有两把刷子。

（摘自《意林》岑荣/文）



《
金
钱
永
不
眠
》
王
帅
著
中
信
出
版
集
团

机，又触发了社会危机。而这个经济危机，究其根源，就是货币数量太少，满足不了商品流通的需求。

将这个结论进一步往外推，你会发现更有趣的事情：在贵金属时代，谁占有最多数量的贵金属（尤其是黄金），谁就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金字塔尖。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然后是英国，再接着是美国，不管是通过战争、殖民，还是其他方式，大家所走的“霸主之路”都差不多，都是争取占有更多数量的黄金。如19世纪英国拥有全球30%以上的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更是拥有全球近一半的黄金储备。这个历史趋势说明，货币数量对社会分工、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

人生如此有意思

我将近30岁的时候，曾经独自旅行了三个月，其中一站是印尼巴厘岛。在海滩上我遇见一对带着小男孩的夫妻，这对夫妻原来在加拿大做中学老师，规规矩矩过“正常”生活。但两年多前，他们认为现代教育太荒唐，会把儿子教坏，于是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卖了房子，揣着为数不多的现金，开始带九岁儿子环游世界。

他们一路上徒步、搭便车、住帐篷、借住民家……就这么走了两年多，预计还需要一年半，就能完成徒步环游世界的壮举。

由于夫妻俩在路边搭帐篷住，就让小男孩跟我同住海边小木屋。小男孩和我“一见如故”，从早到晚带着我玩，跟各种陌生人打交道，混吃混喝，教我如何分辨艺术品真假、如何讨价还价，还在黄昏的海浪汹涌里即兴作诗来。

小男孩会讲九国语言，熟知世界各民族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生活方式，但他的父母好像从来不教他什么（除了数学），都是他自己学的。离开前我问他长大后准备做什么，他说要开飞机，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样就不用走路了。

聊天中我得知他有两个哥哥，我顺口问他哥哥在做什么，他说一个在做律师，另一个在做医生。我问他，哥哥们都做那么“高尚”的职业，他却带着一家人“流浪”，父亲会不会失望？他的回答我永远记得。他说：“我的哥哥们都完成了爸爸的愿望，但我完成的，是爸爸的梦想。”

（摘自《人生总会有答案》金惟纯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